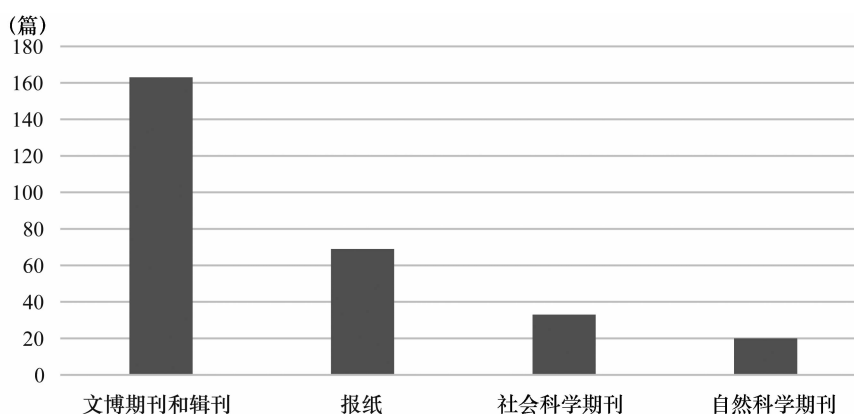


# 新石器时代考古

吴卫红 常经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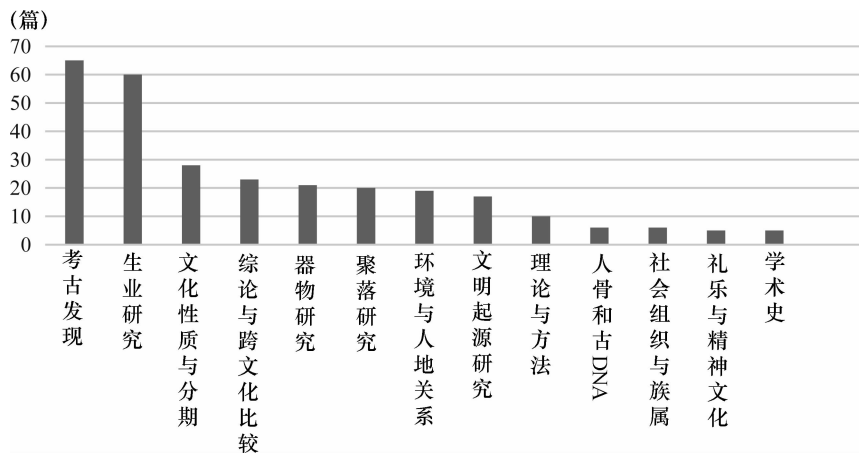
据初步统计，2019 年度出版的以新石器时代为主的考古报告 8 部、简报 65 篇、专著 19 部、论文集 11 部、译著 4 部、图录 26 部、各类论文 220 篇。刊发的期刊以文博类期刊和辑刊为主，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期刊的比重较低。见诸报道的学术会议 17 次，其中论证会 9 次、专题研讨会 8 次（MQB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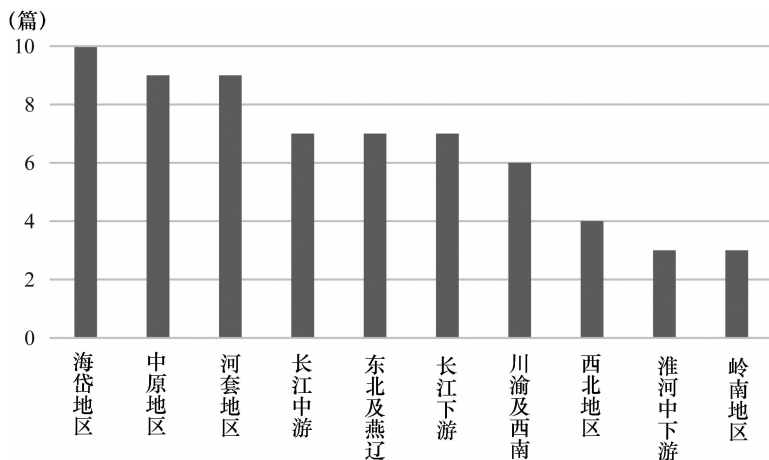
图一 不同类型刊物的刊载数量

文章呈现明显的偏向性。考古发现占比最高，生业研究其次，宏观文化研究、器物研究、聚落研究、环境与入地关系研究较为均衡，文明起源仍是热点。文化性质与分期虽有一定数量，但类型学研究明显不足，理论研究薄弱，方法反思欠缺，礼乐与精神文化、社会组织与族属研究相对冷落，反映出学界对考古学研究的边界日趋谨慎（见图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效果显著，考古发现亮点较多，但区域不平衡。海岱、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等地的工作稳中有进，半月形地带的河套、燕辽及东北、川渝及西南地区持续亮眼，淮河中下游、华南、西北地区相对较少（见图三）。



图二 不同研究方向的文章数量



图三 不同地区发表的考古材料数量

## 一 考古发现

### (一) 东北及燕辽地区

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气候剧烈转变的背景中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始终是学界热点。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 2015 年对穆棱市康乐遗址进行了 4 平方米试掘, 获得了端刮器和边刮器等 62 件器物, 距今 9600~9000 年, 弥补了奥西波夫卡文化和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之间的空白。早年采集的 1 件旧石器时代末期半月形两面器, 显示该地可能有多时期文化堆积(《北方文物》第 4 期)。该所等 2015 年还在饶河县小南山遗址 III 区清理出 8 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 距今 9135~8775 年, 陶器仅见罐, 口沿下戳印的斜向栉齿纹条带特征鲜明; 出土的玉珠、管、璧、斧等跻身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玉器行

列,发掘者称其为“小南山文化”(《考古》第8期)。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随着双塔和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而逐渐清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年抢救性发掘了泰来县东明嘎遗址,出土陶器以施几何纹样的筒形罐、侈口鼓腹罐及弧腹罐为代表,通体压制的石镞和石刃体现较高的细石器工艺,极大地补充了后套木嘎三期文化内涵(《考古》第8期)。昂昂溪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但资料缺乏、层位关系薄弱。该所2013年对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房址、墓葬和灰坑,通体压琢的三角形凹底石镞具有石片工业特征,大量捕鱼、狩猎骨器显示出渔猎经济特性,也印证了梁思永对昂昂溪文化的认识(《考古》第8期)。

小河西文化概念的提出,曾引发了学界讨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等机构在区域系统调查基础上,2015年试掘了阜新市贾家沟西遗址,仅见一处椭圆形房址,陶器多为质地粗糙的平底筒形罐,系列测年距今7850~7650年,明显晚于以往的推测(《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吉林大学等对阜新市塔尺营子遗址试掘,发现半地穴房址,陶器多见平底筒形罐、束颈罐和杯,人面纹石雕像最具特色,距今7450~7350年,属于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

北方草原地带以往工作较薄弱,国家博物馆等单位2016~2019年对河北康保县兴隆遗址进行发掘,揭露出连续四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以房址、室内灶和居室葬为代表,遗物多见陶、石和骨牙角蚌器,属常年性居住聚落,兼具大本营和冬季营地性质。测年距今8800~5200年,初步构建起该区域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序列(《中国文物报》10月11日第8版)。

## (二) 河套地区

阿拉善盟文物局等单位2015年对阿拉善左旗乌兰布和遗址进行初步调查,收集了部分陶器和石器,初划为两组,距今5000~4000年或稍晚,可能受阿尔泰山地区、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文化影响(《草原文物》第1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有关单位2019年对吕梁市德岗遗址抢救性发掘,其中仰韶中期F1达137平方米,是目前所见最早大规模采用片石铺筑的房址(《光明日报》7月7日第4版)。该所及有关单位2012年抢救性发掘了灵石逍遥遗址,揭露出仰韶晚期的房址、陶窑和灰坑等,出土器物以罐、钵、盆为代表,不见尖底器,与白燕遗址一期遗存相当(《考古》第1期)。山西省文物勘测中心2014年对定襄西社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测与调查,采集到较多龙山文化时期和少量二里头至商周时期的遗物(《文物春秋》第5期)。

石峁遗址是河套地区近年最重要的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2018年对皇城台顶的大台基进行了发掘,在南护墙倒塌石块内和墙面上清理出一批石雕像,技法非常成熟,有圆雕、浮雕、阴刻和阳刻,内容包括符号、人面、神面和神兽等,超出学界对4000年前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中国文物报》1月11日第8版);皇城台地点也出土了目前全球时间最早的乐器——口簧(《光明日报》10月9日第9版)。该院及有关单位2017年还对靖边庙梁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仰韶晚期的灰坑埋人现象为研究本地区葬制及社会复杂化提供了重要信息(《文博》第1期)。龙山时期可分两段,早段出土了陕北最早阶段的陶罍;晚段出现了典型的双鬲,显示出龙山后期本地区的普遍特色。该遗址内涵丰富、层位清晰、年代明确,在近年陕北发掘的新石器遗址中非常突出(《考古与文物》第4期)。



陕北南部的工作以往相对薄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 2016 ~ 2018 年对延安芦山峁遗址的发掘, 揭露出一批庙底沟二期遗存, 有大型夯土台基、院落式建筑群、窑洞式房址和居室葬等; 遗物有筒瓦、板瓦、钩形石厨刀, 及玉璜、牙璧、环、钺和刀等, 距今 4350 ~ 4250 年。院落式建筑群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中轴对称式四合院, 板瓦和筒瓦也是目前最早的, 居室葬则是辽西和坝上地区以外首次公布的墓穴式居室葬(《考古》第 7 期)。

### (三) 西北地区

为配合民和县喇家遗址公园建设,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2015 年在施工范围内发掘, 揭露出齐家文化壕沟、房址和墓葬等, 为探究聚落布局、结构和性质提供了关键证据(《四川文物》第 4 期)。四川大学等 2017 年对喇家遗址 VIII1 区进行了小范围发掘, 发现了马家窑文化晚期遗存, 而齐家文化灰坑堆积再次显示出地震迹象(《边疆考古研究》第 25 辑, 科学出版社)。2015 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还对民和胡李家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发现少量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 以尖底瓶、钵、深腹罐和盆为代表(《华夏考古》第 5 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18 年对宁县石家墓地进行调查, 在李家咀及线湾遗址发现有常山下层文化的房址、灰坑和路基等遗存(《大众考古》第 6 期)。

### (四) 中原地区

洛阳盆地是龙山时代文明演进的关键地区。1997 ~ 200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开展了近 1120 平方千米的区域系统调查, 发现从裴李岗文化到东周的遗址(地点) 456 处, 展示了早期中国文明的核心区从零散的聚落到王朝统治中心的社会发展轨迹(《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 1997 ~ 2007 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 科学出版社)。

为进一步了解新密古城寨城址的年代和布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 2016 ~ 2017 年解剖了东城壕, 全面了解了城壕、墙体护坡、城墙基础和城墙主体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出土遗物具有王湾三期的特征(《华夏考古》第 4 期)。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为配合遗迹厅场馆建设, 于 2010 ~ 2011 年进行了发掘, 清理出仰韶、龙山时期各类遗迹 204 个。结合 2017 年勘探结果, 掌握了遗址的总面积和布局概况(《华夏考古》第 6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于 2018 年发掘了淮阳平粮台城址外西北部, 发现的造律台晚期文化遗存与城内堆积一致(《华夏考古》第 4 期)。该院等在淮阳时庄遗址发掘出一处龙山时期的粮仓群, 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粮仓遗址之一(《光明日报》12 月 3 日第 9 版)。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于 2006 年对邯郸薛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发现其文化面貌与后冈二期相似, 并显示出与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邯郸薛庄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 2016 年抢救性发掘了临汾桃园遗址, 庙底沟和西王村类型遗存丰富, 其中 H359 部分遗物具有典型庙底沟类型特征(《文博》第 5 期)。该所 2018 年抢救性发掘的运城轘村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中国文物报》7 月 19 日第 8 版)。

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于2010~2011年对西安米家崖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和客省庄文化遗存(《考古与文物》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16~2018年抢救性发掘了西安马腾空遗址,首次发现关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环壕聚落(《中国文物报》7月19日第8版)。

### (五) 海岱地区

城子崖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2013~2015年揭露出龙山文化环壕聚落,并证实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存在,还复掘了20世纪30年代的探沟(《考古》第4期)。该院2015年抢救性发掘曲阜果庄遗址,揭露出丰富的大汶口中晚期和少量的龙山文化遗存(《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

滕州市公安局于2015年破获滕州岗上遗址文物盗掘案时,收缴玉器59件,其中包括铲、佩、牙璧、环镯等,具有明显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特征(《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

为了解沭河上游及陵阳河地区龙山文化面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7年对日照薄板台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龙山文化早、中期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沭河上游地区史前城址的空白,也扩大了对尧王城类型内涵和范围的认识(《考古》第12期)。

济南焦家遗址的调查、发掘是海岱地区的亮点之一。山东大学等单位于2016~2017年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片墓地及祭祀坑、房址、城墙,揭露出墓葬215座,出土大量精美的白陶、彩陶和玉器等,特别是大量玉器的发现为探讨中国南北方玉器的交流和东西向传播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其墓葬体量、棺椁形制、随葬品多寡等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考古》第12期)。1999年该校对济南周河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大汶口中晚期的典型墓葬,其中M8有明显的等级差异(《文物》第11期)。2015~2016年该校对滕州官桥村南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出北辛文化17个不同形制的灰坑,遗物以鼎、钵、小口双耳罐为代表(《东南文化》第1期)。

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2018年对菏泽何楼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应该是菏泽地区首次科学发掘的大汶口早期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5月5日第8版)。

### (六) 淮河中下游地区

淮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谱系,随着顺山集文化的发现和确立而进一步清晰。南京博物院等单位2012年对泗洪韩井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的遗迹主要有房址、墓葬、灰坑和灰沟,出土遗物包括陶、石、骨、角器(《东南文化》第1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了1985~1986年定远侯家寨遗址发掘材料,一期遗存以平底釜、祖形支脚和陶器刻划符号为典型,属双墩文化。二期遗存以釜形鼎、罐形鼎和大量彩陶为典型,发掘者命名为侯家寨文化(《考古学报》第1期)。该所及有关单位2018年对阜阳迎水寺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少量具有王油坊类型特征的遗存(《中国文物报》11月29日第8版)。

### (七) 长江下游地区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年开始对凌家滩遗址开展聚落考古工作,钻探发现了内、



外壕沟和大量生活区等。对所在裕溪河流域的区域系统调查，为研究凌家滩的兴起、衰落过程提供了大量支撑材料（《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

皖江东部地区以往虽有凌家滩玉器为热点，但整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聚落变迁等情况并不清晰。国家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2011年对马鞍山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展开了大规模区域系统调查，全面了解了该区先秦时期的聚落变迁过程（《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先秦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9~2011年对马家浜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并开展多学科研究，丰富了该文化的内涵，还刊布了第一次发掘的相关资料（《马家浜》，文物出版社）。该所等单位2018年对德清中初鸣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清理出近两千件玉料、半成品和玉器，证实为良渚晚期的玉器加工场所，显现了大规模专业生产模式，为讨论良渚晚期的社会结构、聚落模式和手工业经济提供了丰富资料（《中国文物报》2月22日第5版）。

宁绍平原的考古工作，近年来发展迅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2017年对奉化何家遗址和下王渡遗址方桥发掘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何家遗址从河姆渡文化晚期延续到钱山漾文化时期，明确了钱山漾文化在宁绍平原的分布（《南方文物》第1期）。该所方桥发掘区从河姆渡文化晚期延续至良渚文化中晚期，文化因素复杂，反映了宁绍地区与浙北地区活跃的文化交流（《考古》第9期）。

南京博物院等单位于2017~2018年抢救性发掘常州青城墩遗址，其中一件崧泽晚期龙首纹玉器最为精美（《大众考古》第9期）。

#### （八）长江中游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7~2019年对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王家塆地点进行了钻探和发掘，清理出屈家岭文化墓葬112座、陶器坑3座，并发现了结构多样的独木棺葬具。是迄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显示了明显的社会分化（《考古》第7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5~2017年发掘了京山屈家岭遗址，揭露出丰富的油子岭、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遗存，初步确认了外壕为屈家岭文化，内壕为石家河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一批经焙烧的铜矿石，为探索铜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第3期）。此外，2018年对屈家岭的殷家岭地点进行了全面勘探和局部发掘，发现了油子岭文化中、晚期遗存（《江汉考古》第1期）。该所及有关单位2017~2018年对保康穆林头遗址进行主动性勘探和发掘，发现屈家岭文化晚期墓葬，随葬的玉钺、玉牙璧、象牙管等为探讨屈家岭文化的社会分化提供了重要信息（《江汉考古》第1期）。其于2005年对麻城梅家墩遗址进行发掘，出土遗物以鼎、罐、盆、豆等为代表，与黄梅陆墩和武穴鼓山遗址具有相似性（《江汉考古》第1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12年对郧县肖沟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朱家台文化中期和煤山文化乱石滩类型两类遗存（《江汉考古》第4期）。

伴随“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的开展，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8年对华容七星墩和澧县孙家岗遗址开展了勘探和发掘，在七星墩遗址中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外圆内方双重城壕结构。孙家岗遗址的墓地、墓区、墓群、墓列和单体墓葬的具有层级意义的复杂结构，折射出聚落内部的社群组织状况，大量玉器也成为研究后石家河文化的重要材料

(《中国文物报》2月22日第6版)。

### (九) 岭南地区

近年来的考古工作一直刷新着学界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认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6~2017年发掘了英德青塘遗址,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角骨器等一万余件,建立起距今2.5~1万年完整的地层与文化年代序列,为华南—东南亚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标尺(《考古》第7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5年对广州茶岭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墓葬、灰坑和窖穴等遗迹,以鼎、豆、罐等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与石峡文化有一定关系,但又有自身特点(《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2~2015年对闽西汀江流域进行了区域调查,初步构建了该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发展序列(《福建省汀江流域考古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

### (十) 川渝及西南地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2018年对会理河头地遗址II区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房址和灰坑等,以壶、罐等为主的文化面貌与猴子洞和李家坪遗址早期遗存相当。为研究早期石棺葬的墓葬形制、葬俗提供了新资料(《四川文物》第3期)。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于2013年抢救性发掘巫山柏树梁子墓群,揭露出大溪文化早中期的墓葬和灰坑,出土器物中碗、豆、盘等圈足器以及拱嘴形支座较为典型(《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涪陵渠溪口遗址于2013年发掘出土了高领壶和折沿罐等,具有玉溪坪文化晚期特征(《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巴南熊家湾遗址2013年的抢救性发掘揭露出玉溪坪上层文化二期、玉溪坪文化晚期和最晚段三期遗存,为研究原始祭祀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四川文物》第5期)。2018~2019年对合川吊嘴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遗物以卷沿罐、高领罐和敛口钵等为代表,与玉溪坪文化早期遗存具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物报》8月23日第8版)。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7~2018年抢救性发掘广南大阴洞遗址,该遗址墓葬葬式多样,出土了陶、石、骨器和炭化稻等,年代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之间,是云南已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洞穴墓地(《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 二 专题研究

### (一) “最早的中国”与文明起源

关于“最早的中国”,孙庆伟强调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庙底沟类型所反映的黄帝时代是“最早的中国”(《中原文物》第5期)。韩建业认为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形成于庙底沟时代,具备有中心有主体的多元一体结构,以农为本和祖先崇拜是其最基本的特质和最核心的观念(《中原文物》第5期)。张国硕认为这一概念应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据优势等三项基本



条件,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当为陶寺文化之邦国(《中原文物》第5期)。叶舒宪认为不必拘泥于文字的有无,玉文化催生出龙山及三代文明,已经具备了万年中国说的历史深度(《遗产》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易建平强调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是华夏族文明的源头,而且是各个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的源头,因此要跳出“中原中心论”,找寻更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29日)。

关于中华文明,刘庆柱认为核心理念是“和”与“中和”,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文明(《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孙庆伟认为其早期阶段形成了三个基本特征:重瓣花朵超稳定结构、理性化与人文化的文明路径、家国一体的文明进程(《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12日)。马新认为自龙山时代诞生并连续发展的早期村落组织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陈胜前从整体的视角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种体系的形成,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是奠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17日)。高江涛认为形成的总趋势是多元一体,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与碰撞(战争)是演进的外动力,而务实与创新则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史学月刊》第6期)。《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汇集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项成果,张弛指出距今5500~5000年类似于酋邦的社会组织形成;而距今5000~4300年西辽河、陕晋豫交界处、凌家滩等衰落,良渚、石家河、陶寺等古国兴起,昭示了区域文明的出现(《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

关于各区域文明,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礼制和祭祀文明的重要源头,构成了中华文明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光明日报》1月24日第9版)。朱乃诚认为屈家岭文化局部地缘性政治组织既有冲突又和平共处,不仅奠定了江汉地区文明的基础,也对中原的文化发展与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郭伟民认为石家河文化在一个广域空间里达成了聚落的高度整合,构建了一套自身的社会行为和文化风格,创造出自身独特的观念体系,其吸附力比良渚和陶寺更明显;石家河聚落揭示的早期国家形态,无法套用现有国家概念,与陶寺、石峁那种暴力社会和权力强化的社会有所区别,与良渚那种过分渲染意识形态和强化宗教信仰的社会也有较大差别(《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韩建业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虽非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直接前身,但其本身就是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报》8月5日)。

## (二) 综论与跨文化比较

韩建业认为海岱和中原进入龙山时代的时间并不一致,龙山时代诸文化实际成为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主体文化(《华夏考古》第4期)。他还将龙山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大部地区的丧葬传统分为富贵并重的海岱传统、重富轻贵的江汉传统和重贵轻富的中原传统,地域与上古“三民族”或部族“三集团”的分布相对应(《江汉考古》第4期)。此外他还从欧亚大背景下认为齐家文化因客省庄二期文化西进而诞生于陇东南,晚期又间接受到中亚等地文化影响,并将新鲜血液带到中原,促成二里头“王国”文明的诞生,在中国“青铜时代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文物》第7期)。

曲彤丽等梳理了欧亚大陆早期雕塑,认为中国早期雕塑的出现可能受到了欧亚大陆西部的影响(《考古》第10期)。李新伟认为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与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彩陶虽然相似,但因中亚没有发现有桥梁作用的彩陶文化,还难断定两者之间有直接的



文化交流（《中原文物》第5期）。陈坤龙等梳理了近年传统考古和冶金考古成果，提出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末，铜冶金生产已在河西走廊实现本土化，中原同样可见本土化进程，冶金技术知识融入已有的传统，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独特的冶金传统（《考古与文物》第3期）。

陈国庆认为燕辽地区与周邻持续存在文化交往，但并不强烈，且周邻地区对燕辽地区的影响要远大于燕辽对外的文化输出（《燕辽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兼论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科学出版社）。

段天璟等认为东北南部小珠山中层文化特有的短线刻划纹催生了左家山下层文化，引起了左家山上层文化西向波及哈民忙哈文化，向东对莺歌岭下层文化施加了强大影响（《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王月前认为之字纹、席纹、弦纹和几何纹等均在西辽河流域孕育、发展和传播，而彩陶和条形堆纹则来自东北之外并使西辽河流域率先进入东北地区文明的门槛（《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朱乃诚认为红山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弯板状玉臂饰的渊源可能与凌家滩文化有关（《文物》第8期）；夏商时期常见的玉虎造型尽管在凌家滩文化中初露萌芽，但其源流还应是石家河文化晚期（《中原文物》第2期）。

吴晓桐认为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多璜联璧向北传播至晋陕高原，又在陕北与甘青的互动中传播至齐家文化。年代最早的断裂缀合起源于大汶口、良渚和薛家岗文化时期，拼凑缀合的产生是晋南先民在制玉技术与艺术上的双重创新（《江汉考古》第6期）。黄果娴对海河平原后冈一期文化的典型遗址分期后，认为后冈一期是北福地文化与北辛文化交融的结果。早期阶段北福地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石北口一期一段时汶泗流域的乙类北辛文化进入，不断与北福地文化融合、创新（《华夏考古》第2期）。王青分析了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M33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和“响铃”，并将镶嵌铜牌饰的起源分为铸造工艺、镶嵌工艺、纹饰寓意三个方面，绿松石镶嵌和纹饰寓意等应来源于东方沿海地区，由夏人借助西北传入的铸铜技术，创造出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这种全新礼器（《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刘文强认为侧孔钺最初形成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或为玉石刀改制而成；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早期西渐至晋南、陕北和甘青地区，其侧孔有特意钻取的可能（《西部考古》第17辑，科学出版社）。

丁品比较了钱山漾文化和禹会村类型的器物，认为龙山前期环太湖与皖北淮河流域有明显的文化互动，后者对前者的辐射和影响占绝对主导，这种接近单向的文化传播可能是由人口迁徙和流动造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1辑，科学出版社）。

邓聪等通过对涌浪、甘草岭等遗址出土玉器的分析，认为良渚玉器特别是玉琮向外跳跃性的、辐射数千公里的扩散，其动力须成为重新评估良渚文化早期复杂社会的一项重要因素（《南方文物》第2期）。

叶舒宪考察西部古代玉矿资源后认为齐家文化与庙底沟类型关系密切，用玉皆以蛇纹石为主，而已知蛇纹石的主产地是渭河上游武山。随后齐家文化将西部玉矿资源区向西拓展，并生成玉石之路的路网，奠定商周秦汉用玉的资源基础（《中原文化研究》第4期）。

### （三）文化性质与年代

杜占伟等以查海遗存为基础，将兴隆洼文化划为三期五段，距今8150~6950年



(《考古》第3期)。陈伟驹辨析了小河西文化为距今7850~7700年,兴隆洼文化为距今7730~7100年,缩短了二者的年代跨度,小河西文化的命名需再探讨(《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高云逸将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修订为红山文化中期,认为坛、庙、冢并非红山文化晚期共存,综合崇拜对象的变化推论红山文化于距今约5250年或略早进入文明社会(《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徐昭峰认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距今6670~4070年,时代越晚,来自海岱的文化影响越重。文化演进中的多元性,造就了经济和农业的多样性以及族群迁徙交流的常态性(《辽东半岛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华书局;《考古学报》第2期)。他还认为后洼下层是与小珠山一期有较强亲缘关系的独立考古学文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小珠山四期应属偏堡子文化范畴,含部分大汶口和土著文化因素,偏堡子文化的源头应在下辽河流域探寻(《考古》第10期)。

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内涵和范围一直有争议。魏坚等认为已知最早的仰韶时代白泥窑文化可分为鲁家坡、白泥窑和王墓山三个类型,距今7000~5800年,深受中原和辽西影响,直接后继者为庙子沟文化(《考古学报》第7期)。老虎山文化分布于环岱海地区,距今4600~4300年,与庙子沟类型有渊源,且受阿善文化寨子塔类型晚期影响,与永兴店文化分属不同谱系,与陕北、晋中和冀西北地区的文化有较大差异(《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

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性质和年代一直未达成共识。邸楠通过对庙梁、五庄果梁等遗址的系统分析,认为仰韶晚期虽受海生不浪文化影响,但仍可称为仰韶文化五庄果梁类型(《文博》第1期)。邵晶以甗和鬲的分别出现为标志,将龙山前期遗存分为“寨山组”和“庙梁组”,前者上接仰韶晚期“尖底瓶陶器体系”,后者下启龙山晚期“双鬲鬲陶器体系”,是石峁文化的重要来源(《考古与文物》第4期)。对于石峁类遗存的性质,许宏根据对牙璋的分析认为下限应晚至公元前1600年或更晚,并建议慎用与“夏”有关的词汇;考虑到石雕作品的“旧物新用”,石峁遗存至少是两个不同的人类群团的遗存(《中原文物》第1期)。

杨谊时等利用一年生炭化植物种子的<sup>14</sup>C年代数据检测河西走廊已有炭屑和骨骼<sup>14</sup>C年代的可靠性,发现模型年代与已有的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年代基本一致,而青铜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却存在明显的误差(《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第12期)。

大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略显分散。卢瑞宇认为磁县下潘旺遗址第二类型遗存可称下潘旺文化,距今6650~6450年,与镇江营文化和后冈一期文化共同组成镇江营文化系,来源于后李—北辛文化向华北平原的扩张。两次文化面貌的转变均与外来因素传入有关,而最终消亡则因庙底沟文化的扩张(《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邵晶将庙底沟遗址“龙山文化”陶器分为甲、乙组,分属庙底沟二期和西王三期,同意空三足器作为龙山时代来临的标志,认为甲组处于龙山时代早期,乙组处于仰韶时代末期(《华夏考古》第1期)。段天璟等认为运城盆地龙山时代荆村文化的标志性器物除陶甗和平底盆形鼎外,还应包括平底罐形鼎,梳理东关文化陶甗与鬲的演变得出三里桥文化在运城盆地承袭并取代了东关文化的结论(《考古》第6期)。田建文重新审视了陶寺2002 II M22,认为在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陶寺遗址有一个时间不长的双耳罐流行时期(《文博》第5期)。新砦与王湾三期的关系仍有较大分歧。魏继印认为新砦文化不是介于王湾三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普遍存在于各地区的阶段性遗存,也不是从王湾三期文化

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遗存，而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与其他区域的王湾三期文化并存（《考古学报》第3期）。李维明再次分析了2002年新砦出土遗物，认为以花边罐为代表的陶器群应属于二里头文化而非新砦期，新砦遗址的二里头文化聚落有70万~100万平方米（《中国文物报》5月5日第6版）。

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相对完善，但讨论仍在继续。龙腾文等通过贝叶斯模型方法提出了各文化阶段可能的绝对年代分布假说，后李文化的起始应提早1000~1500年；大汶口、龙山和岳石文化的模型结果的重叠，表明可能存在不同文化群体共存的情况（《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饶宗岳等从地层学和类型学角度对该假说提出异议，认为以往判断是相对严谨的（《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

东南地区的福泉山遗址是良渚文化分期的关键材料，赵肖楠将良渚文化墓葬分为五个阶段，距今5300~4300年（《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王清刚分析了好川墓地典型器物，认为钱山漾初期环太湖地区主要遵循良渚末期的文化传承，龙山初期以后，大汶口文化因素才产生强烈冲击并催生出典型钱山漾文化（《四川文物》第6期）。白国柱等认为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与太湖流域、淮河流域、滁河流域甚至海岱地区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难以归属其中，建议称为“朝墩头类型”（《东南文化》第1期）。

#### （四）聚落与通道

##### 1. 聚落形态

杜启明基于建筑学语境，认为石峁遗址最初居民应来自北方牧区，大型土石建筑时代应较晚，具有宗教场所的特征（《中原文物》第1期）。

孙波以区域为空间单位，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区域性聚落布局的基本轮廓大体上与地理分区相合，不同地域以城址为中心形成区域性实体和围绕自身的聚落群。其繁荣在于持续积累与环境稳定，而宗教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政治成为社会运作的杠杆（《海岱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

牛世山等讨论了石家河聚落群和陶寺城址的营建形式，前者是以城为中心向周围随机扩展，后者则具有宫城（宫室）居前、其他功能区居后的总体安排，代表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圈的城规思想，影响深远（《江汉考古》第5期）。

郭立新等利用卫星地图并结合已有材料，提出古云梦泽周边自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阶段的城址经历了由圆而方的变化，该区的连城体系特点之一是特别重视城内外水运和灌溉体系（《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刘辉认为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月牙形带状分布，是由本区特殊的地貌特征、水热条件及生业形态决定，城址兴废与全新世气候波动有高度的耦合（《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 2. 墓葬和其他遗迹

对于葬具、葬式的研究，郭明提出同时具备墓葬、石墙和积石三种要素才能称为“积石冢”，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具有历时性和相似性的特征，只流行于特定时期和特定人群（《华夏文明》第7期）。马金磊认为新石器时代土洞墓至迟在距今5300年出现在黄河中游，距今4500年前后流行于黄河上游，同时出现合葬、迁葬和调整葬式的行为（《文博》第4期）。彭小军等认为仰韶时代中期到龙山时代早期，独木棺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流葬具，龙山时代晚期独木棺葬俗逐渐式微，但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因被陶寺



显贵继承。随着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不断强化，历经近两千年的史前独木棺传统最终被板棺习俗取代（《南方文物》第6期）。赵江运认为俯身葬最早发现于马家浜文化中晚期的太湖西部，并扩散到太湖东部和江淮、宁镇地区，崧泽早期之后大幅减少，成为非正常死亡者的特殊处理方式。“崧泽化”进程对葬制的转变有一定作用，但太湖东西部的文化整合或许才是葬制改变的主要诱发机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张弛对葬仪的研究较为特别，认为大汶口 M10、东山村 M91 和八里岗合葬墓 M13、M14 都存在以棺椁分隔的葬仪空间，不同空间随葬了象征“饮”和“食”的器具乃至猪骨，其中饮具更为靠近墓主。饮具都是成对，并且大都成套，饮用方式多为热饮。不同案例存在不同饮具组合，说明当时有多种酒类或不同产源的酒类，不同的酒类也许还有不同的喝法（《江汉考古》第1期）。

在具体的墓葬形制研究中，戴向明系统分析了陶寺遗址的墓葬资料，揭示出龙山时代陶寺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反映了陶寺集团从崛起到兴盛，再到衰落的完整过程（《南方文物》第6期）。何弩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辨认出部分中期墓葬，结合其在晚期遭到破坏的现象，认为这不是人性而是政治报复行为（《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王叶等将元君庙墓地合葬墓分为单一人骨埋藏特征合葬和多种人骨埋藏特征合葬两类，合葬墓的使用过程并非都是一次填埋与安葬，存在多次使用现象（《江汉考古》第1期）。马萧林认为灵宝西坡墓地很可能由西往东逐渐埋葬，随葬大口缸和玉钺或受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影响（《考古与文物》第5期）。孙卓认为西坡墓地在墓葬规模、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上存在强烈的分层现象，陶器在埋葬过程中可能具有礼仪含义，而男性在墓地中有着更加明显的分化（《华夏考古》第1期）。向其芳认为天门邓家湾墓地经历了从屈家岭早期早段至后石家河文化阶段。三个墓区有布局上的相似性与等级上的差异性，布局相似性反映了社会结构从核心家庭到扩大家庭再到家族的发展，等级差异性则说明家族与扩大家庭内部存在分化（《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施劲松分析了宝墩文化的墓葬，认为该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较一致，似乎尚未出现阶层分化（《考古》第4期）。

曾丽结合“烧烤坑”的认识，论证了烧烤坑遗迹的存在，并强调在发掘中要将烧烤坑从灰坑中分离出来（《文博》第2期）。于璞对王墓山坡下遗址仰韶文化聚落的用火遗迹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在建造房屋过程中，可能用火对居住面和部分窖穴进行了烘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期）。

### 3. 文化通道

高江涛系统研究了洛阳盆地与晋南地区早期的文化通道。至少在庙底沟类型以来有一条中条涇津道，而盐道很可能是其功用之一，寺里一坡头遗址可能是当时的交通控制点（《中原文物》第1期）。虞坂巛道极可能在史前已存在，应该有“盐道”和“军事道路”作用（《中原文物》第2期）。轹关隘道也可能在史前已存在，先秦时期作为军事要道和盐、铜矿等重要资源的运输通道（《中原文物》第3期）。吴艾妮通过梳理遗址，认为新石器时代湘粤古道已经存在，但属于民间自发的探索阶段，没有形成明确的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

## （五）器物研究

### 1. 玉石器

邓淑苹以《周礼》“六器”为引，提出玉琮的必要条件是方形，主要功能是祭地。黄河上中游史前玉琮是原生型，而良渚晚期突变出来外壁平直的为次生型。早期外弧壁的方镯是被清末金石学家误导而命名为“琮”（《中原文物》第2期）。郭明建将良渚文化划为良渚遗址群、太湖东北部和东南部三个玉器风格区，有大、中或小型的玉器工业。大中型应有专业制玉工匠或集团，产品自用外还部分输出。玉器资源的不均衡性，导致各地贵族使用奢侈品的不同策略（《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

崔天兴等认为浙川沟湾遗址的玉坯废料为砣具切割而成，部分玉（石）环可能是史前原始砣具，这也是目前史前砣具切割工艺的完整证据链（《南方文物》第6期）。杨晶认为良渚人已经普遍使用了线切割和片切割，砣切割技术尚未有明确证据。玉器纹样基本为直接刻划（《南方文物》第1期）。

翟少冬分析了陶寺遗址的石器和石料，认为大崮堆山的变质砂岩应是其主要石料，产品主要为镞，可能有产品输出。精英阶层对石器工业的控制和管理可能更多地表现在对石料资源和产品的分配上（《中原文物》第5期）。刘莉等考察了灰嘴遗址的石器生产，认为仰韶人群主要是满足自身需要，石料来自周围；龙山晚期时成为石器生产地，主要生产白云岩石铲，其生产的专业化可能是由社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实施（《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科学出版社）。孙瀚龙结合类型学分析了“石犁”的考古学背景，整体建构了“石犁”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1辑，科学出版社）。付永旭认为华南地区的凹石有内陆和沿海两个明显分布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战国秦汉时期甚至更晚，用于加工坚果和处理贝壳，或是穿孔石器的半成品和加工石器的工具（《考古》第8期）。高云逸通过人类学的比较分析，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凹窝石器至少有一部分是作为钻木取火工具——钻帽而制作和使用的（《文物春秋》第3期）。

### 2. 陶器

赵辉认为当今考古学的陶器研究要趋于体系化发展，要重视多重记录，进行基础信息的分类和计量，以及信息间相关性的综合，认识陶器的“操作链”和“生命过程”（《江汉考古》第1期）。李文杰认为轮制仅指快轮拉坯成型，快轮制陶的直接证据是螺旋式拉坯指痕和麻花状扭转皱纹；快轮制陶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技术传播”规律的制约和“技术思想”的影响（《文物春秋》第4期）。卫雪等认为仰韶文化尖底瓶的尖底结构及凹凸不平的内壁具有良好的沉淀澄滤作用，小口利于封盖和开启。大瓶的双耳主要固定绳索，中小瓶的双耳则在于系绳，用以辅助提取但非远距离提行（《考古》第11期）。杨雅琼等从胎土、成型、修整、装饰、焙烧五方面对顺山集的陶器进行观察，认为第一、二期制坯方法从泥片贴筑转为泥条盘筑（《东南文化》第1期）。

### 3. 其他器物

洪石认为新石器时代嵌绿松石漆器仅见于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以腕饰和头饰为主，胎骨多木胎，基本为散点式或拼合式平嵌，使用者等级很高（《考古与文物》第3期）。马萧林梳理了西坡遗址的朱砂并比较了民族志，认为其表达思想观念在仰韶文化中期已发展到较成熟规范阶段，也是社会角色和身份差别的重要标识物（《中原文物》第6期）。



#### 4. 科技分析

李涛分析了红山文化核心区非日用陶器（主要是筒形器）及日用陶器的成分，两者无明显差别，均就地或就近取土，由相同的生产者生产；不同地区应有各自独立的筒形器生产，主要被本地家户消费；程度较高的“专业化”不适用于红山陶器（《北方文物》第1期）。周本源等对秦安大地湾二期和四期的白色块状颜料进行了化学组成、物相组成和热性能分析，认为成分选择的连续性反映了彩陶制作技术的连贯发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鲁晓珂等对陶寺、两城镇等多地的白陶进行了锶同位素和微量元素分析，认为两城镇的原料采用附近的海滨沉积岩，其他遗址的原料采用了陆源沉积岩；陶寺可能与河南的原料来源接近，二里头遗址白陶至少有两处来源：一处与瓦店的接近，另一处与南洼的接近（《华夏考古》第6期）。陆青玉等分析了山东丁公等遗址的龙山文化白陶的岩相和成分，认为鲁北地区白陶生产并未出现原料垄断，权贵阶层对此的控制并不严格；桐林向西经前埠、史家到丁公遗址一线，存在着部分白陶的流通现象（《考古》第10期）。崔天兴等检测了浙川沟湾遗址的彩陶和周边土样，认为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彩陶文化的传播为工艺、技术等文化模式而非实物交换模式（《中原文物》第4期）。贺娅辉分析了黄瓜山文化的彩陶和施衣陶图像和成分，认为与福建内陆和台湾地区同时代文化具有相似性，存在一个跨越内陆和台湾海峡的互动圈（《南方文物》第6期）。

苏荣誉通过分析石峁铜刀和环首刀石范，认为具有本土传统，年代和中原商代器相近，是否存在铸铜活动乃至铜工业还不明确；由于中原均为块范法铸造，石峁对中原的影响证据并不充分（《中原文物》第1期）。江旭东等对屈家岭遗址屈家岭晚期至石家河早期的矿石进行了检测，部分为经过焙烧的产物，是否与冶炼活动直接相关还不清楚（《江汉考古》第3期）。

### （六）生业研究

#### 1. 生业综论

美国新考古学先驱弗兰纳利在墨西哥奎拉那魁兹洞穴遗址的发掘而形成的著作成果，首次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是第一次将系统论应用于一个具体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并对农业起源的动因进行了检验和阐释（《奎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上海古籍出版社）。

袁靖等分析了全国400余处遗址的动植物遗存，概括了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生业内涵及特征，探讨了中国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生业状况及生业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郭静云等对旧、新石器的生业资料重新分析，认为农业是人类改变生态的副产品之一，不宜以农业为指标探讨新石器革命的含意；人类从狩猎到渔业因而定居，因定居而到食用谷类，再生产食物，提出将新石器革命称为“蓝色革命”（《中国农史》第4期）。邓振华认为粟黍农业在北方完成驯化后，有三条南传路径：由甘肃向西南传播至四川盆地，由山东向东南传播至福建、台湾等地，由南阳盆地传播至两湖地带（《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14日）。

区域文化的生业讨论多集中于动植物。李涛梳理了俄罗斯远东滨海的炭化植物遗存，认为粟、黍是该地旱作主要种类，最早的农业出现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东北是非常可能的来源地（《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吕鹏等对黄河上游的生业方式及转化按阶段分析，认为尽管其生业主线比较统一，但方式及转化却非常复杂（《南方文

物》第1期)。赵志军基于华县东阳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了渭河平原古代农业的发展与变化:仰韶早期处在农业起源的过渡阶段,以种植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日渐增强;仰韶中期完成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进入以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华夏考古》第5期)。陈亭亭等分析了甘肃中东部7处遗址材料,发现齐家文化早期甘青东、西部作物均以粟为主,晚期在小麦、大麦传入甘青后,西部转变为以粟黍农业为主、麦类农业为辅,而东部仍以粟黍为主,可能源于不同地区对气候趋于冷干的反应程度不同(《第四纪研究》第1期)。蒋宇超等通过对山西滹沱河上游、蔚汾河流域的调查采样和周家庄遗址的系统采样分析,认为山西高原龙山文化时期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粟居于主要地位;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黍的比重相对更高,但水稻比重明显低于临汾—运城盆地(《第四纪研究》第1期)。吴文婉认为后李文化仍以狩猎采集为主,动植物驯化为辅,低水平的食物生产是后李文化自给自足经济的主要特征(《考古》第8期)。唐丽雅等还分析了江汉地区9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的植物遗存,将该区划为南部稻作农业区和北部稻旱混作农业区,文化传播和传统在一定条件上影响到大格局内部的农业经济特点(《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潘艳等梳理了长江下游的生业经济,认为有两方面特征:一是多元性与本地性,二是湿地生态始终是资源开发最主要的背景(《南方文物》第1期)。李珍分析了北部湾沿海新石器时代贝丘和沙丘遗址的生业,是利用海洋资源的混生渔捞狩猎采集经济,海洋性文化特征鲜明(《南方文物》第3期)。

徐紫瑾等从废弃过程角度分析上山文化储藏坑的行为意义,认为上山文化居址形态呈现出周期性迁居、非稳定性定居的特征,虽然已有农业生产,但仍保留着较高的流动性,农业形态比较原始(《南方文物》第4期)。张俭通过对东南地区石镞的多视角分析,分出“狩猎”“渔捞”“战争”三种功用,推测有三种生业模式:沿海贝丘的渔捞、狩猎模式;内陆山地的狩猎、采集模式;河谷的原始农业模式(《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陈国鹏等通过对民族志中橡子利用资料的梳理,结合考古遗存,基本确定了浙江新石器时代橡子的利用模式是用作食物或饲料,复原了橡子加工的操作链。橡子的加工利用还与社会流动性的降低有关,甚至促成人群定居(《北方民族考古》第7辑,科学出版社)。

## 2. 植物遗存分析

大植物遗存的分析工作较多,植硅体、淀粉粒分析也日益受到重视。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工作较突出。

夏秀敏等对华县东阳遗址仰韶早中期的植硅体和植物分析显示,在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同时,水稻至少在距今5800年时已传入关中(《人类学学报》第1期)。刘洋等对陕西富县畔上遗址的分析认为,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开始了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并主要利用黍类作物(《考古与文物》第1期)。陈思源等分析了旬邑枣林河滩遗址,农作物仅见粟、黍,黍的比重相对较高(《南方文物》第1期)。李晔娥等通过对伊洛地区系统调查的57处遗址材料分析后,显示最迟在仰韶时代开始,粟黍得到了最广泛种植,水稻和小麦仅在少数遗址发现,比重较小(《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科学出版社)。钟华等认为洛阳王圪塔遗址龙山晚期存在着稻旱混合的农业经济模式,旱作为主,大豆也是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农业考古》第1期)。唐丽雅等梳理了环嵩山地区龙山、新砦时期的农作物遗存,认为是以粟、黍为主并至少还包括水稻和大豆,但小麦证据十分薄弱



(《华夏考古》第3期)。王灿等对郑州地区13处裴李岗—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植硅体分析,揭示出该地在裴李岗和仰韶文化中晚期均属于以黍为主的稻—旱混作农业模式,得益于全新世适宜期暖湿气候下的稻作北传;裴李岗时期农业模式受地形和水文因素影响,但仰韶文化中晚期开始打破了自然条件限制(《第四纪研究》第1期)。

在黄河下游,陈松涛等对烟台午台遗址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遗存植物分析认为以粟黍为主,可能存在小规模稻作农业(《江汉考古》第1期)。郭荣臻等对菏泽十里铺北遗址的浮选分析,发现大汶口晚期农作物种类仅见粟和黍,龙山文化则呈现出多种农作物并存的现象(《中国农史》第5期)。张飞等认为章丘黄桑院遗址龙山文化的农作物仅见粟、黍,粟的比重更为重要(《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宇田津澈朗等对栖霞杨家圈遗址北侧的低平地段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在大汶口晚期和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密度较大的水稻植硅体和芦苇等喜水植物伴出,推定这片扇形低地可能是水稻田和河道的交错分布地带(《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

淮河流域的工作成果不多,赵珍珍等认为淮阳平粮台龙山时期呈现出稻旱混合的农业经济模式,发现的2粒小麦无测年数据,其年代不详(《中国农史》第4期)。程至杰等对临泉宫庄遗址分析显示,稻作农业从大汶口早中期稳定延续到龙山时代,综合淮河中游其他证据和该遗址粟、黍的缺失,认为大汶口早中期该地区可能没有形成稻粟兼作农业模式(《农业考古》第3期)。

长江中游地区,姚凌认为荆门屈家岭遗址距今约5800年起形成了稻作农业占主体的生业模式。距今5600~5300年粟作农业开始出现,但比重始终很小(《江汉考古》第6期)。田洁等认为房县计家湾是典型的稻旱混作农业,随着屈家岭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水稻一度成为次于粟的农作物(《南方文物》第5期)。唐丽雅等认为鄂西南山地的穆林头遗址除了粟、黍、水稻等农作物之外,还包括一些果品类植物遗存,属于山地生业模式(《南方文物》第5期)。

长江下游的皖东南地区植物考古以往相对空白。邓振华对马鞍山姑溪河流域3处遗址的植物浮选,发现该地区自马家浜至崧泽、良渚时期的作物结构均以水稻为主,立新遗址的粟未确定是否为崧泽早期,如若确认则是目前邻近地区最早出现粟的遗址,对探索粟的南传具有重要价值(《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郑晓萁等对宁波鱼山遗址开展了植物浮选,证实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生业模式从以采集狩猎为主逐渐转变为依赖农业,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也由野生植物逐渐转向以水稻为主(《农业考古》第6期)。戴锦奇等对闽侯县白头山遗址进行植硅体分析,发现距今5000年左右闽江下游已种植水稻,旱作农业在距今4700年左右传播至闽江下游,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农业格局。认为闽江是稻旱农业向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第四纪研究》第1期)。夏秀敏等综合广州茶岭遗址植硅体等证据,认为至少在距今4000年前茶岭先民已有粳稻为主的栽培稻,呈现出水稻种植和狩猎采集结合的多样化经济模式(《第四纪研究》第1期)。

淀粉粒分析开展不多。陈涛系统梳理了国内已开展的石磨盘、石磨棒微痕分析和淀粉粒分析研究案例,认为中国史前时期的石磨盘、石磨棒是多功能石器,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包括野生类)、坚果和块根块茎类植物(《农业考古》第6期)。刘莉等对偃师灰嘴的带流陶壶进行了淀粉粒及植硅体分析,认为是用于过滤米酒,很可能是对发芽的黍和稻谷进行糖化,壶外底烟痕应是温酒所致,这类器形的突然出现可能受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影



响,反映了一种新的饮酒方式和距今5000年前后跨地区文化交往加剧、社会等级化发展的情况(《中原文物》第6期)。孙青丽等对凌家滩的刻槽盆进行了淀粉粒分析,认为其主要用于研磨、杵捣和烹煮野生植物(薏苡、禾本科、小麦族等),刻槽盆功能在不同时期无明显变化(《人类学学报》第1期)。

### 3. 动物遗存分析

邓惠等从家鸡骨骼形态入手,建立了一套出土家鸡的骨骼形态鉴定标准,并认为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支持中国是最早的家鸡起源地(《考古》第7期)。菊地大树等通过梳理中国近年马骨出土状况,推测新石器时代应没有出现人为介入马匹育种的现象,真正意义上的家马利用商代晚期才开始(《南方文物》第1期)。王晓敏等系统介绍了阳原于家沟动物骨骼及埋藏学与动物考古学的分析过程,认为其复杂猎食行为是晚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时期人类对动物资源强化利用的表现,各类工具和技术都得到了磨练和改进,动物的初级管理和生产可能已经开始萌芽(《于家沟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姜富胜等通过模拟实验,分析了山东丁公遗址蚌制品,认为取料加工是以石器打制为主,存在片切割与打击相结合,而三角帆蚌和椭圆背角无齿蚌极可能是原料的主要来源(《海岱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宋艳波研究了江苏西溪、圩墩和浙江马家浜遗址动物遗存,认为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各遗址的脊椎动物构成无明显变化,但软体动物资源开发与利用渐多,家畜种类仅为狗和猪,肉食资源主要来自鹿类和鱼类(《东南文化》第5期)。陈曦等系统研究了广西崇左5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脊椎动物遗存,反映出热带季节性雨林景观,生业以渔猎为主,猎取动物的种类广泛,但鹿类占有重要地位;洞穴遗址和台地遗址的动物组成差别明显,可能为遗址间的社会分工所致(《南方文物》第2期)。余琮等发现距今12000年以来岭南所有出土动物骨骼的遗址中都有相当的野猪遗存,距今6000年左右广西革新桥发现少量家猪,距今4400年左右家猪饲养业已有一定规模(《南方文物》第4期)。

### 4. 同位素分析

侯亮亮总结分析了中国已发表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猪、狗的C、N稳定同位素数据,发现部分时空框架内先民与猪、狗的稳定同位素特征相似,证实了家猪和家犬可作为重建生业经济的替代性指标,可以大致反映先民的生业经济(《南方文物》第2期)。陈相龙等对洛阳中沟遗址仰韶晚期和王圪塔遗址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的人骨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认为两地虽均以粟、黍等C<sub>4</sub>类食物为主,但后者水稻比重有所增加,显示出本地与南方稻作文化的密切交流;两地墓葬人群的肉食比重明显高于灰坑人群,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仰韶中期以来中原地区社会分层的现象(《第四纪研究》第1期)。戴玲玲等对河南下王岗遗址的猪骨(牙)进行了牙齿形态和食物结构分析,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猪以野外放养为主,而龙山时期变成圈养,其中部分可能为反野的家猪,突破了以往“非家即野”的认识(《江汉考古》第6期)。管理等通过对宜兴骆驼墩遗址猪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形态学鉴定,认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该遗址马家浜文化早期存在家猪驯养行为(《南方文物》第1期)。赵春燕等对凌家滩和韦岗遗址的动物遗骸进行了锶同位素分析,推测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狗和鹿是当地动物,而韦岗遗址出土的猪也可能为本地出生(《南方文物》第2期)。



### （七）人骨和古 DNA

Jenna M. Dittmar 等对临潭磨沟遗址齐家文化的一成年男性进行了体质人类学观察，其颅骨处有愈合程度较高的开颅术痕迹，穿孔切口特征显示由刮削法完成，开颅原因可能与巫术仪式有关（《人类学学报》第3期）。韩涛等梳理了宁夏新石器时代人骨材料，认为打石沟组、菜园组和沙塘组虽都可归入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但打石沟组更接近“古中原类型”，菜园组和沙塘组则更接近“古西北类型”，至少存在两种不同体质类型的群体（《文博》第4期）。崔银秋等对瓦店龙山时期的人骨进行了古 DNA 提取，认为与现代汉族遗传距离最近，显示出中原已形成了现代汉族遗传结构的早期框架，外来基因对汉族遗传结构未造成根本改变（《华夏考古》第6期）。赵永生等结合大汶口文化独特的枕骨变形和人工拔牙等特征，对郑州西山、浙川沟湾、房县七里河、枣阳雕龙碑的人骨进行了多视角分析，推测四处遗址应有从海岱迁徙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居民（《东南文化》第5期）。

蔡大伟等对德隆沙塘北塬遗址齐家文化早期的马骨进行了古 DNA 提取，发现了起源于欧洲的 C1 亚组谱系，支持甘青地区是外域家马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的认识，并由此经过驯化传入中原；还发现了一种源西南西伯利亚的新型野马 *Equus ovodovi*，纠正了中国野马全部是普氏野马的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

### （八）环境和人地关系

陈强强等运用考古学关联建模方法推算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人口规模至少为 50.61 万人，耕地约 102.22 万公顷，垦殖率约为 1.99%。遗址周围 3000 米范围内是单个聚落耕地的主要分布区，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83.43%（《地理研究》第12期）。刘威定量分析了澧县城头山遗址的房址及柱洞，结合环境考古成果认为柱洞随时代的发展直径长短不同，有可能反映了人口的持续增加或急剧减少（《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

何弩分析了陶寺遗址水资源利用和控制问题，认为汾河的支流南河与自然河流宋村沟为普通居址和手工业区提供生产水源，并将地表水引入宫城，形成自然池苑景观，宫城内饮水可能更依赖井水。陶寺中期宫城的排水渠系统以及中晚期的导洪沟槽是主要的水控制体系，而早期的“凌阴”储冰是一种特殊利用方式（《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1期）。徐峰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水资源管理范式进行了思考，认为厚实的基础经济和充足的劳动力为良渚人营建大型工程积累了社会实力成本，也展示了社会复杂化程度。对水资源的投资和管理刺激了大范围的合作，很可能也曾引发冲突（《中原文化研究》第5期）。

冷程程等利用洪河遗址剖面重建了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环境信息，在距今 7024 ~ 3820 年，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孕育了典型的昂昂溪“渔猎文化”，而距今 4000 年左右逐渐变冷干，昂昂溪文化由于生业经济的特殊性而逐渐衰落（《第四纪研究》第1期）。陈莹璐等重建了民和县二方村古环境，发现在全新世大暖期背景下，官亭盆地发育了肥沃疏松的黑垆土类古土壤，但后期气候和地质灾害不仅毁灭了喇家遗址齐家文化聚落，也导致土地资源的严重退化（《地质学报》第11期）。张海运用系统思维和多尺度分析方法探讨了漯河地区中全新世的古环境与人地关系，发现气候波动导致以河流泛滥和湿地消亡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先民倾向于近水居住，并采用筑高而居以应对水文变化。龙山时期环境趋

于稳定,先民从黄土岗地边缘大规模扩散至冲积平原(《华夏考古》第4期)。袁广阔认为伊川盆地仰韶、龙山时期遗址的分布多数集中于伊河干流和支流两岸台地上,但比较分散,龙山时期明显选择了高于仰韶时期的地方居住(《中原文化研究》第4期)。胡飞认为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经历了温凉偏湿、温暖湿润、更加温暖湿润以及逐渐趋于温和偏干,直至洪涝频发的演变过程,且与顺山集文化、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时代文化的兴衰密切相关(《南方文物》第1期)。

高蒙河等通过分析遗址分布边缘线和空白区,发现上海的岗身以西距今6000~4000年间,人类活动空间向东扩展了约20千米,并形成了数条“东缘线”,并产生了较大规模的聚落形态(《历史地理研究》第2期)。唐亮等重建了姚江—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以来的人地关系,在距今6300、4500年有两次区域性海侵事件,并与多个遗址的文化间歇层对应。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数量少,主要分布于山麓缓坡地带,而晚期显著增加且向平原地带扩散;良渚文化晚期遗址数量大幅减少,显示海平面上升及环境持续恶化制约古人人类活动强度(《第四纪研究》第5期)。

### (九) 社会组织与族属

陈畅认为结构主义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构古代人群社会组织和认知方面的研究路径,赤峰大南沟墓地显示有三类人同时存在于墓地的整个阶段,彩陶和刻画纹样是整个墓地的性别象征符号,墓地人群的亲属组织为母系继嗣群体(《北方文物》第4期);临潼姜寨遗址显示其人群内部借用自然分类体现文化分类,在居址布局的规划和安排中,不断强化社会分层的合理性(《江汉考古》第1期)。富宝财认为以辽西为重点的北亚西部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从氏族发展到部族社会,居住单位和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东北亚研究论丛》第11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建业通过文化谱系和古史传说的对应,认为老虎山文化南下与“稷放丹朱”相对应,石峁类型当属和后稷族系同源的文化;石峁类型末期的陶寺晚期文化因素,可能属周先祖不窋“自窋于戎狄之间”之“戎狄”文化;结合老虎山文化的重要源头是庙底沟类型(黄帝部族),石峁人群当属黄帝后裔北狄先民(《文物春秋》第4期)。张溯等结合古史传说和文献认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主要是颛顼族及其后裔的文化,石家河晚期的衰弱和文化变迁,是北迁中原和文化重心转移的结果(《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靳松安等认为豫西南鄂西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或是华夏与苗蛮两大集团关系并非和平的直接体现(《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 (十) 礼乐和精神文化

王青认为早期中国装饰神灵形象的组合式玉器中,约有四类玉器(权杖斧钺、王者羽冠、鸷鹰崇拜和图腾柱崇拜)是采用象形和转喻的思维模式创作,基本是沿着从良渚到大汶口、龙山文化,再到中原夏商周王朝的逻辑向前演进,使得早期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具有浓厚的东方特质(《中原文物》第3期)。袁广阔等认为中原新石器时代的玉礼器大都是异地传播的结果,且时段不同器物来源不同。不断引进玉礼器使中原的礼制不断整合和完善,最终形成二里头文化比较完备的玉礼制度(《中原文物》第2期)。

吕宇斐等对石峁外城东门和祭祀坑进行了天文学考察,认为它们明确朝向了夏至日出



方位角，证明石峁巫觋已完全掌握了立竿测影的系统测量方法及建立营建都城、宗庙和宫殿的平面直角坐标系方法（《考古与文物》第1期）。孙周勇认为石峁皇城台骨制口簧是通过绳子拉振实现簧舌振动发声，是世界口弦类乐器的祖先（《光明日报》10月9日第9版）。张蕾认为陶寺早期大墓中的音乐文物可能有固定的鼓磬组合，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初现（《中原文物》第3期）。

### （十一）理论与方法

郭伟民认为学科边界和认知边界均是考古学研究的边界，考古学需要坚持自身学科特色、秉持开放态度，坚持大视野、精细化、多学科（《中国文物报》7月5日第6版）。陈胜前讨论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变迁，认为新石器——原史考古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比较成熟，对建构系统的时空框架作用巨大，但对旧石器——古人类考古、古典——历史考古产生了约束，且制约了范式变迁；范式变迁中存在着一些外在但关键的约束，限制了考古学理论的扩展（《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他还探讨了史前狩猎采集者的生存模式，狩猎大动物的真相，战争、权力在文明演化中的角色和影响等问题（《人之追问：来自史前考古学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裴安平以考古发现为依据，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五大历史问题，并将史前有关历史问题置于血缘组织与聚落群聚形态的视角上进行考察（《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关于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论已经广为学界所认知，其原著首次由龚辛等在中国翻译出版，该书全面考察了人类社会中典型复杂社会的组织形态与影响因素，是对人类社会演化研究的重要推进（《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对瑞典学者蒙特留斯的类型学代表作《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滕固译）也进行了重版（《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在方法方面，方辉回顾了中国区域系统调查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史，认为由最初关注实践层面的遗址界定、陶片二次搬运可能带来的面积误判等问题，逐渐转向阐释层面上遗址的性质与功能定位等，在拓展学科国际化的同时，要考虑如何发挥历史地理和方志文献丰富的本土优势（《中国社会科学报》8月13日）。马萧林认为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存呈现出不同的保存状况和埋藏特征，与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对遗存的叠加影响有密切关系，提出新石器时代至三代的调查要关注区域聚落形态或单个聚落形态，而后段则注重于墓葬的空间布局（《中国文物报》12月17日第3版）。

对于古史时代的研究，孙庆伟认为可疑之而不可尽否之，研究者应有史学上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爱”（《遗产》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韩建业认为“谱系法”（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和“变迁法”（文化巨变、聚落巨变和战争迁徙）是研究古史传说的两个重要途径（《遗产》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 （十二）学术史

李新伟回顾了新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七十年历程：1949~1979年是资料积累和理论探索期，重在建立时空框架，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较多；1980~1999年是重大发现和理论建设的“黄金时代”，红山、良渚和陶寺文化刷新学界认知，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被引入，共同促成了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2000年以来重要发现频出，多学科助力，在新旧

石器过渡、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蓬勃展开,初步具备了国际视野(《中国文物报》9月6日第5版)。

吕鹏等回顾了新中国动物考古学的七十年历程:1949年~20世纪70年代是开始期,侧重于定性研究;20世纪80~90年代是形成期,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研究实践广泛开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发展期,学科体系逐步完善,涵盖古DNA和稳定同位素分析在内的跨学科合作促进研究向纵深发展(《中国文物报》12月6日第5版)。

张婷系统回顾了中国考古学中文化定名问题的探索历程,从学术史上理解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的价值,回顾了命名问题的历程及意义(《华夏考古》第3期)。李贝等立足于安特生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实践,认为其研究成果异彩纷呈的表象背后,凸显了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价值和地位(《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黄尚明以李济生平为线索,对其所处的时代、人际关系、生平活动和贡献进行了总结(《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张新斌等以时间和重大事件为基础,系统梳理了从1921年河南考古的发端至今的发展脉络,勾勒出一幅河南考古的全貌图(《河南考古史》,大象出版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全面梳理了本单位自1979年成立以来的考古工作和学术成果(《浙江考古1979~2019》,文物出版社)。

### (十三) 英文刊物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15种英文刊物发表了50篇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关的文章。期刊主要包括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9篇)、*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9篇)、*Antiquity* (7篇)、*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篇)、*The Holocene* (3篇)等。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包括13位外国学者(含旅居的中国人)。研究方向包括生业经济(23篇)、环境和人地关系(13篇)、器物(7篇)、综论与聚落(5篇)、语言和古DNA(2篇)。

与中文刊物相近,生业、环境与入地关系依然是发表的重点,但中国学者倾向于新材料公布,且材料重要性明显高于中文刊物所刊;外国学者侧重于多学科和跨区域认识,统计学和方法论占优。传统研究内容发表有限,作为国内热点的文明起源研究也十分少见,显示出中西方的考古学范式仍有差异。

#### 1. 综论与聚落

Zhang Chi(张弛)等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发展进行了宏观考察,认为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等传统文化核心区在新石器晚期均发生衰落,而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顺势崛起。西北冶金技术与海岱制陶技术和宴饗仪式的结合成为中原社会政治网络的重要组成,玉器的强化利用限制了将青铜作为武器和装饰品的趋势,也使中原逐渐形成了欧亚大陆特有的青铜文明(*Antiquity*, 369)。

Liu Li(刘莉)等在区域系统调查基础上,分析了伊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变化和社会发展趋势。裴李岗文化晚期出现最早的小型定居村落,部分地区可能形成了两级聚落等级;仰韶中晚期聚落数量和面积显著增长,两级聚落等级普遍形成;龙山文化早期聚落急剧减少,但晚期又显著增长,并首次出现了三级聚落系统,社会复杂化明显加剧(*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521)。Yu Shi-Yong(于世勇)等基于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之间的解析关系建立了一个分析经济不平等的方法论框架,通过对大汶口和良渚遗址的案



例分析,认为墓葬面积是个人或家庭财富的可靠代表 [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11 (9) ]。Dong Yu (董豫) 等对梁王城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的多视角分析认为,年长的成年女性具有特殊的丧葬待遇以及稀有食物消费,墓葬面积和遗物数量并不是衡量社会身份的唯一方式 ( *Antiquity*, 368 )。

## 2. 生业经济

以往倾向于关注农业社会中的农作物,较少关注狩猎—采集环境中的植物利用。Dorian Q. Fuller 等系统梳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果树遗存(桃、杏、枣),认为中国的果树驯化可追溯到距今 6000 ~ 4500 年,处于农作物驯化完成和城市社会兴起之间。多年生植物的种植是一种新理念,使人类从谷物的短期回报转移到果树的长期投资中,且与其他手工业一道成为城市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28 (3) ]。Deng Zhen - Hua (邓振华) 等分析了距今 9000 ~ 7000 年的广西灰窑田、隆安鲤鱼坡和塘底冲三处贝丘遗址和距今 4500 ~ 4200 年大石铲文化时期的谷红岭遗址材料,显示出以橄榄为代表的坚果资源在岭南有长时间利用,而凹石的普遍发现也佐证了此结论。但橄榄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极低,水生软体动物及其他陆生动物仍可能是更重要的食物来源 ( *Antiquity*, 372 )。

黄河流域的粟黍、水稻与小麦一直是植物考古的重要问题。Wang Jia - Jing (王佳静) 等对秦安大地湾一期的罐形鼎进行了淀粉粒分析,发现了粟、黍、橡子和生姜等,其中生姜是全世界已知最早的发现。多种植物资源的发现支持了早期农业首先出现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的假设 (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529 )。Song Ji - Xiang (宋吉香) 等对山西涑水河流域仰韶文化至商代晚期的 25 个遗址开展了分析,发现粟作农业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种类,水稻和小麦显然是次要组成;作物加工模式从龙山时代开始出现多样化,部分遗址在收获时有大规模加工,而另一些则集中在家庭层面,可能反映出家庭之间劳动力和经济的差距 [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11 (2) ]。Wang Can (王灿) 等对郑州 10 处仰韶文化遗存的植硅体分析,发现粟、黍和水稻共存,但粟、黍占主导地位。与裴李岗文化相比,水稻种植不再局限于冲积平原,小型遗址中出现混合农业,显示农业已成为中原普遍的谋生方式 [ *The Holocene*, 29 (1) ]。Luo Wu - Hong (罗武宏) 等对蚌埠双墩遗址土壤样品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在距今 7300 ~ 6800 年前已经稻、黍共存,粳稻是双墩的优势作物,并处于驯化的中期阶段,将黍在淮河中游出现的时间提前了 2000 年 (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02 )。Qiu Zhen - Wei (邱振威) 等对钱塘江上游荷花山遗址土壤剖面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自早全新世以来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数量增多、尺寸变大、鱼鳞状纹饰递增,显示出水稻驯化的持续发展;而生土层中水稻扇型和双峰型植硅体的发现,证明了野生稻的存在,进而推断该地区可能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摇篮 [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11 (4) ]。

José M. Cobo 等利用东亚和东南亚 201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驯化水稻数据,估计了水稻在该地区传播速度每年 0.75 ~ 0.92 公里,明显高于考古学文化的影响速度,显示出该地区水稻传播主要是由农业人群的扩散导致 (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01 )。

Song Yan - Bo (宋艳波) 等对沂源扁扁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系统分析,鹿、猪等中型哺乳动物是肉食资源的主要种类;动物骨骼部位缺失普遍较严重,显示出非本地宰杀利用的特征,指向扁扁洞可能非长期居住地 (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521 )。Wu Xiao - Tong (吴晓桐) 等对山西清凉寺、山东尹家城和丁公遗址的鳄鱼骨板进

行了锶同位素分析,发现均为土生土长,意味着4000年前扬子鳄的分布已北至黄河流域,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夏商时期可能将扬子鳄视为“龙”[*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11 (3)]。

### 3. 环境与入地关系

Wu Qing-Long (吴庆龙) 曾于2016年推测黄河上游的堰塞湖与夏朝有关联,但Zhang Yu-Zhu (张玉柱) 等通过对黄河上游循化盆地和积石峡的岩相学、沉积学和年代学分析,认为积石峡存在两个独立的滑坡堰塞湖,是逐渐消失而非“暴洪”现象,其消退时间也较夏朝的建立早了至少1600年,因此这次地貌事件与夏朝的建立无关(*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18)。Cui Jian-Xin (崔建新) 等探讨了关中、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变迁的潜在气候和环境因素,认为全新世晚期气候的干冷化过渡在不同地区是不同步的,存在从北到南的年代差,而内蒙古中南部史前人群在距今4500年的南移与北端气候的干冷过渡相吻合(*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20)。Zhang Jun-Na (张俊娜) 等研究了伊洛流域的地貌演变,发现距今9200~7000年前大部分地区是与湖泊和湿地有关的泛滥平原,随着河流冲刷河道,于7000年前形成平坦的一级阶地,距今4000~3800年前频繁的大洪水淹没了一级阶地,并导致洛河向南改道,为二里头的兴起创造了理想的地貌条件(*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531)。

### 4. 器物与技术

Yue Jian-Ping (岳健平) 等对伊春桦阳和桃山遗址旧石器过渡阶段的石制品研究,揭示出石器工业在新石器化历程中的重要转变,主要表现在石料资源、打制技术、工具类型的多样化发展,这种技术演化在俄罗斯远东和日本北海道同样存在,并显示出与古气候、环境变化的相关性(*Antiquity*, 371)。

Anke Hein 等对安特生1924年在马家窑和齐家坪等遗址发掘的陶器(收藏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进行了岩相和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认为尽管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在陶器类型上有明显差异,但对于陶土和掺合料的选择标准却具有连续性,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工艺传统(*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3)。Andrew Womack 等对洮河流域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也呈现出相同的结论(*Antiquity*, 371)。Ilaria Patania 等对道县玉蟾岩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进行了显微形态和红外光谱分析,发现大部分沉积物是人为反复燃烧所造成的,其中陶土与火的组合主要用来煮动物骨骼和提取骨髓、油脂,推测玉蟾岩早期陶器的出现可能与此有关(*Geoarchaeology*, 35)。Li Wei-Ya (李为亚) 等对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磨盘和磨棒进行了微痕和模拟实验,认为加工采用的是干磨而不是湿磨(*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3)。

### 5. 语言和古DNA

Li Yu-Chun (李玉春) 等分析了大量现代藏族人群的高分辨率mtDNA数据,结合不同海拔地区作物遗存的<sup>14</sup>C测年和人骨碳同位素值数据,证实了藏族人群中存在大量源自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组分,还表明粟黍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低海拔区长期定居后,采用了耐寒的大麦农业并向高海拔迁徙,最终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原。粟黍农业人群遗传组分进一步促进了现代藏族人群与其他东亚人群的遗传分化,表明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输入对现代藏族人群基因库产生了重要贡献[*National Science Review*, 6 (5)]。

长久以来,有关汉藏语系语言起源的时间及地点一直都存在争议。Zhang Meng-Han (张梦翰) 等通过系统发生学方法,结合系统的地理分析,重构了汉藏语系下各个分支的



亲缘关系，推算出汉藏语系起源于距今 5900 年的中国黄河上游地区，并且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出现有关，符合语言随农业扩散的观点 [Nature, 569 (7754)]。Laurent Sagart 等采用同样的方法，但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数据库，更多考虑了与驯化物种相关的词语，认为汉藏语系起源于 7200 年前的中国北方地区，且与磁山文化晚期和仰韶文化早期相关 [PNAS, 116 (21)]。